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關於中共參加韓戰預謀的若干問題

doi:10.30390/ISC.199507_34(7).0006

問題與研究, 34(7), 1995

Wenti Yu Yanjiu, 34(7), 1995

作者/Author：馬仲可

頁數/Page： 64-7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95/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7_34\(7\).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7_34(7).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關於中共參加韓戰預謀的若干問題

馬仲可

(韓國翰林大學教授，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壹、前言

俄羅斯戰史研究委員會委員長，葉爾欽總統軍事顧問，現役大將德米特里·伏爾科格諾夫（Dmitri Volkogonov），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四日為在韓國出版的他本人著的史達林（*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一書的「韓文版序」中說，「根據我在這裡提供的一部分韓戰開始前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三人之間的來往電報，我們可以知道韓戰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金日成挑起的，但實質上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策劃和批准的。」^①

另外一位在上述戰史研究所任首席研究員的長期從事韓戰研究的資深韓戰問題專家加布里爾·可特柯夫（Gavril Korotkov），在他一九九二年十月著的金日成和史達林，以及韓戰（*Stalin and Kim Il Seng*）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說：「原始資料證明，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藉史達林七十祝壽機會而到莫斯科的毛澤東，與史達林一起，對在朝鮮半島進行戰爭問題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其內容既包括原則問題，也包括詳細的戰爭方案（War scenario）。」^②

一九九二年初，俄羅斯聯邦政府成立了五人組成的「韓國戰爭文獻檢索委員會」由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任委員長，該委員會以記者招待會或在各種出版物上撰稿的方法，不斷地透露韓國戰爭的始末，特別是在韓戰準備階段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三人合謀的詳細內容。

一九九三年一月，俄羅斯共和國國防部宣布，他們將向外界逐步解密並公布約五百萬份舊蘇聯情報、軍事、外交當局的外交軍事檔案，其中當然也包括韓戰資料。當年六月，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應日本朝日新聞駐莫斯科記者的要求說明了其中有關韓國戰爭的資料。^③八月二日，在紐約出版的U.S. News & World Report（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刊登了包括史達林在策劃韓國戰爭時使用過的朝鮮半島地圖在內的韓國戰爭開戰前檔案的詳細摘要，包括一部分史達林、中共的毛澤東、北韓的金日成在密室裡策劃韓國戰爭的極機密資料。後來，於一九九四年六月，俄國總統葉爾欽將

註① 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史達林（韓文版），漢城，世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頁十。

註② 加布里爾·可特柯夫，史達林和金日成，以及韓戰（上）（韓文版），漢城，東亞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頁一二七。

註③ 朝日新聞（日本），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版二。

一部完整的舊蘇聯—北韓關於韓戰的歷史資料做為禮物贈送給來訪的韓國金泳三總統，這份長達二十萬字的俄文原始資料，隨即譯成韓文在南韓各報章紛紛刊登。^④以此為契機，其間在國際上似趨於冷寂消匿的關於韓國戰爭的研究又重新開始活躍起來。

研究韓國戰爭（自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的歷史層面，正如對許多其他歷史事件一樣，必須同時回答概念型的問題（what-question）和因果型的問題（why-question），也就是要回答“what a event really was or what it account to”以及“why it happen”。

前者應是將「部分」加以綜合的垂直解釋（vertical interpretation），在這解釋中，歷史學者們應該像「揭露者」（expositor）那樣把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展現給聽者；而後者應是說明事件因果關係的水平解釋（horizontal interpretation），這種解釋如將歷史史實當成一篇社會科學論文看待，對其進行「准科學深度」的因果分析。^⑤

韓國戰爭是一場冷戰型戰爭，先是一個民族人為地分成「擁共」和「反共」兩群，隨後「擁共群」由社會主義陣營（主要是中共和蘇聯）支持，「反共群」由資本主義陣營（主要是美國）支持，猶如一場借用朝鮮半島這塊土地打的世界兩大陣營的宗教戰爭，經三年戰爭殘殺，導致數百萬生靈塗炭。

韓戰的冷戰性質，再加上中共式民族主義，使得作為參戰一方的中共，無論在回答上述「What」問題和解釋「Why」問題時，使用具有強烈價值傾向（Value-oriented）的概念和方法。中共一直到現在無休止地美化自己和「同志」一方，百般醜化異己和「敵人」一方，結果，即使在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特別是自一九七八年以後至今，在中共大量出版的各種關於韓國戰爭的研究成果和回憶錄中^⑥，仍然充斥肆無忌憚的誇張和謊言，本文涉及的中共與韓戰開戰的關係問題亦在其內。

二、中共至今仍堅持「韓戰是中共所始料未及的」

中共的韓戰專家們在自己的著文中，無一例外地強調，韓戰爆發對他們是突如其來的，因而事先毫無思想準備。例如在板門店談判一書中，該書作者，韓戰初期曾任中共駐北韓第一任代表的柴成文就使用這一類說法：「……黨的三中全會和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剛剛結束，參加兩會的代表，有的剛返回住地，有的還在途中，有的還沒有離開北京，正在京城商定人才，籌集恢復生產的資金。他們帶著周恩來『方向和目標是確定了的，但道路是我們一步一步走去的』會後囑咐，準備回去大幹一場。而

註④ 馬仲可編，《解密了的舊蘇聯文獻檔案解說》，漢城，自由總聯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

註⑤ W. H. Dray, *The Limit of Scientific History*, (New York: Seriesies, 1964), p.56.

註⑥ 朱建榮，「中國的朝鮮戰爭研究」，《中國研究月報》（東京），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頁八，

就在這個時候，朝鮮內戰突然爆發了。」^⑦類似這種刻意模式化了的中共「事先不知朝鮮半島竟會有戰火」、「當時的中共怎能經受得起又一場戰爭」的敘述俯拾皆是。如：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司令員彭德懷^⑧、副司令洪學智^⑨、兵團司令楊成武^⑩等中共志願軍的主要指揮官的回憶錄，^⑪以及最近出版的文獻，^⑫皆千篇一律地如是說。

根據以上所提到的舊蘇聯秘密檔案，現已真相大白，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毛澤東不僅事先知道韓戰，且與史達林共同協商，為金日成出謀策劃，積極鼓勵金日成挑起戰爭，並向金日成保證，只要美軍參戰，中共就出兵相助。

舊蘇聯秘密檔案的解密公布，還使得過去幾十年以來的爭論，也就是誰是戰爭的挑起者的爭論迎刃而解，結果使在國際政治學界一直堅持韓戰是美國為實行其全球侵略戰略而唆使李承晚政權發動的「老修正主義學派」的理論失去立足之地。

國際上的韓戰研究學界，大致分為兩大學派，一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學派，另一是修正主義（revisionism）學派。^⑬前者把韓戰看成是「國際共產主義」擴張戰略下北韓金日成大規模奇襲南韓所致，後者把韓戰看成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政策產物。^⑭

對韓戰的傳統主義學派的解釋中，一個重要理論就是所謂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這種理論認為韓戰是由包括金日成在內蘇聯和中共通過事先的密室策劃和共謀而發動的。「陰謀論」進而要求辨別誰是戰爭挑起者，並主張應以此追究戰爭責任。^⑮

但是，修正主義學派認為戰爭是美國和南韓挑起的。早在韓國戰爭期間的一九五二年，美國有一左派政論家 Isidore F. Stone 出版了一本名為韓國戰爭秘史的書（在中共，該書的譯名為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幕），他在書中根據一些片斷的事實，進行獨特的推理，大膽地對美國政府的有關韓戰的解釋提出質疑甚至反駁，間接地

註⑦ 柴成文，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頁三十一。

註⑧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頁三。

註⑨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頁一。

註⑩ 楊成武，楊成武回憶錄（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八月，頁十二。

註⑪ 類似的書還有：楊得志，為了和平，北京，長征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江擁揮，三八軍在朝鮮，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杜平，志願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李聚奎，李聚奎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陳慶，陳慶日記（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

註⑫ 賦有代表意義的文獻為：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序言（楊成武），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頁二；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三月，頁一；另外，出版不久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頁三四五、四一〇中也是同樣的敘述方式。

註⑬ 金徹凡編，關於韓國戰爭，漢城，乙酉文化社，一九九〇年五月，頁十九。

註⑭ 美國國際政治學者D. F. Fleming 本人對韓戰持有修正主義的觀點，但他對傳統主義的觀點的總結和解釋也認為相當精辟，甚至勝過傳統主義者。參閱：D.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Origins, 1917~1960*,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 1961), 第一卷、第二卷。

註⑮ 梁好民等，關於韓半島分裂的再認識，漢城，羅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頁三九四。

認為韓戰是美國和李承晚向北方發動的侵略戰爭。^⑯

Stone 的這一本書對後來在國際政治學界形成韓戰問題上的修正主義學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美國國際政治學界修正主義的創始人 Fleming 教授的關於韓戰的修正主義解釋，基本上是在 Stone 的命題下稍加發展而成的。^⑰至於持有 Stone 類似修正主義觀點的學者中，比較著名的有 Kolko^⑱夫婦，Gupta^⑲教授等人。修正主義學派中還有一部分學者，他們認為中共絕對不可能參加韓戰預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 Friedman 和 Selden^⑳，Gittings^㉑，Whiting^㉒，Griffith^㉓等人，在國際政治學界，人們為了把他們與後面要講到的新一代的修正主義學派相區隔而稱之為老修正主義學派。

在美國還有一部分以 Bruce Cumings^㉔為代表的被稱為「第二代韓國問題專家」的所謂的「新修正主義」學派學者們，他們不同於曾經在韓國當傳教士的人和其子女，以及曾任駐韓美國代表等職的「第一代韓國問題專家」，而是在美國攻讀政治學，學會韓國文字語言，並以包括韓戰問題在內的韓國政治問題獲得學位的 Bruce Cumings 等人。他們認為韓戰不應該簡單地被認為是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開始的，而是由於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所支持的韓國反動勢力和要求革命的韓國人民之間的階級鬥爭早就存在，所以戰爭的開始應向前追溯至少五年。

傳統主義學派和新老修正主義學派的長達四十多年的曠日持久的論爭，一方面使得兩派的理論變得越來越精練以至趨於天衣無縫，而另一方面則由於缺乏關於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三人在戰爭開始前進行的各種密秘活動的佐證而感困惑。^㉕而中

註^⑯ I. 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2).

註^⑰ D. F. Fleming, 前引書。

註^⑱ The Kolkos, "The Root Out Those Among Them,"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No. 42, November 1973, pp. 560~566。

註^⑲ Karunakar Gupta, "How Did the Korean War Begin?", *China Quarterly*, No. 52, October-December, 1972, pp. 699~716。

註^⑳ Edward Friedman & Mark Selden, ed., *American'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pp. 48~63。

註^㉑ John Gittings, "The Great Asian Conspiracy," Edward Friedman & Mark Selden, 前引書, pp. 108~132.

註^㉒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ian Co., 1960), pp. 78~90.

註^㉓ Samuel B. Griffith,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347.

註^㉔ Bruce Cumings, ed., *Child of Conflict: 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 1943~195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或者 Bruce Cumings, e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㉕ 當然在這期間也零星曝光了一些這類密室策劃的背景材料。如亡命到西方來的曾在北韓和東德工作過的蘇聯軍官 Kyril Kalinov，曾任蘇聯駐日本大使館情報員的 Yuri Rastvorovoy，曾任波蘭駐平壤大使館武官的 Paul Monat 等寫了關於韓戰問題的回憶錄。而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赫魚曉夫回憶錄則為眾所周知。另外，亡命蘇聯的前北韓中將李相朝（作為金日成的特使與毛澤東會談過），北韓作戰局長俞成哲（參與制定韓戰作戰方案），北韓司令部俄語翻譯朱永福（翻譯了蘇聯顧問的有關韓戰開戰的俄文命令）等人的隨筆回憶錄等，他們異口同聲地證明韓戰是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通過協商開戰的。但缺乏足夠的精確度和客觀性乃是這類證言的弱點。

共則在這兩學派的爭論中得漁利，長期以來不僅否認中共在韓戰爆發前早已參與戰爭預謀的事實，還掩蓋這場戰爭是北韓率先突襲南韓而引起的歷史事實，而堅持說是美國和南韓先攻擊北韓的。^②但近年，中共媒體改變了以往關於「戰爭是南韓與美國挑起的」的說法，而開始改口使用一種中性（neutral）說法，譬如：「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朝鮮戰爭爆發」^③等等，也就是說在戰爭起始原因問題上中共開始將「說法口徑」一致地從老修正主義轉向新修正主義。但是至今仍然緘口，否認中共積極參與策劃和預謀韓戰的事實。

三、中共支持韓戰和參與策劃過程

一九九二年初成立的俄羅斯聯邦政府「韓國戰爭文獻檢索委員會」所披露的許多文獻中，有不少直接牽涉中共和韓戰的關係。有一封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當時蘇聯駐北韓大使史吉科夫（A. Stikov）打給史達林的機密電報，其內容為在歡送中國駐北韓大使回國述職的宴會上，金日成向史吉柯夫講的話。^④金日成說：「毛澤東向我說過先解放中國，然後再解放朝鮮。現在全中國解放了，該輪到我們打了。毛澤東向我建議應該誘使南韓先進攻而後發制人，但李承晚按兵不動怎麼辦？我想以突襲方法往南打下去，不知史達林同志能否同意。為此，希望訪問史達林。」金日成又說：「毛澤東答應了必要時支援。」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北韓政治局長金一前往中國，與中共領導人討論了關於把中共部隊中的朝鮮族官兵全部轉移到北韓，變成北韓軍，以準備攻打南韓。金一與毛澤東談了一次，與周恩來談了四次，與高崗（中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談過多次。在談判中，金一說明了他們將要發動的「祖國解放戰爭」。^⑤毛澤東又說，在中共部隊中有三個朝鮮族師，其中有兩個師佈防在東北的牡丹江和長春地區，這兩個師可以馬上轉移到北韓，而另一個師目前正在中國南部與國民黨殘餘部隊作戰，所以這一個師最快也要等一個月以後才能開始進行轉移。

後來的事實證明，「朝鮮族部隊轉移到北韓」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在金日成著作集中，有金日成對回到北韓的上述部隊的歡迎詞（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金說：「歡迎你們從中國歸來，你們是國際主義戰士。」^⑥

註^② 中共的韓戰問題著作，經常引用新、老修正主義學派的關於韓戰的觀點做為自己的旁證，如在楊鳳安，王左成合著，*驚馳朝鮮戰爭的人*，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頁十一中就引用了很長一段老修正主義學派I. F. Stone的*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Korean War”一書的中譯本）中的論述，並說「這位美國學者說出了實話」。

註^③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頁一。

註^④ 克里姆林文獻檔案編號：“KA45 / 1 / 346 / 7”，摘引自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前引書，頁三六九。

註^⑤ 李相朝，*我和朝鮮戰爭*，漢城，韓國日報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頁五二。（筆者註：李相朝為大陸國共內戰時，中共軍中朝鮮族部隊的創始人之一，曾任北韓參謀長、停戰談判首席代表、北韓駐蘇聯大使，後因與金日成齟齬，亡命蘇聯。）

註^⑥ 金日成著作集，第五卷（日文版），平壤，外國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七八。

毛澤東又說，金日成應做好隨時打奇襲戰，或打長期戰的準備。毛強調，如果戰爭變成持久戰，日本有可能參戰幫助南韓。不過北韓有蘇聯和中國這個鄰國做後盾，所以不要害怕，毛澤東向金一說，如情況緊急，中國也將派兵。

毛澤東建議金日成，近期不要開戰，其主要原因是，看整個國際形勢，目前對彼等不盡十分有利，特別是，中共正與蔣介石軍隊鏖戰中，萬一有緊急情況，無法出兵幫助北韓。毛澤東希望金日成暫時等到中共把蔣介石部隊全部打垮。^⑩

一九五〇年一月，林彪以毛澤東的名義給莫斯科發送一封電報，報告在中共軍中目前仍有一萬六千名以上的朝鮮族官兵。林彪的電報中談到，中共軍隊越過長江南下時，朝鮮族官兵開始動搖起來，不想繼續戰鬥，而其中一部分，要求去北韓。林彪提出應滿足他們的希望。莫斯科立即指示史吉科夫詢問金日成對此事的態度。^⑪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史吉科夫回電莫斯科，史於一月九日與金日成面談，金日成告訴史說金已派三人去中國，找中共領導人具體會談繼續轉移中共軍中最後一批朝鮮族官兵的問題。金日成說，打算把這些從中國歸來的朝鮮人整編成一個步兵師和兩個步兵團。^⑫

最後一批中共軍中的朝鮮族部隊向北韓轉移，是一九五〇年二月進行的，當時代表中共與北韓代表金光俠處理這一任務的是聶榮臻，他在回憶錄中詳細記述了這一段經過。^⑬

日本的朝鮮半島問題專家荻原遼（Hagiwara Ryo），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用兩年半時間閱覽了近一百六十萬頁的美軍在朝鮮戰爭期間從北韓擄獲的北韓文獻，其中有中共軍方發放給上述即將去北韓的朝鮮族官兵的手冊實物和毛澤東、朱德、林彪等十幾個中共頭目的題詞，其中林彪題詞中有一句話：「希望你們在朝鮮解放戰爭中立功。」^⑭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在朴憲永家中進行的私人宴會上，金日成談了自己對朝鮮半島目前形勢的看法。^⑮

金日成首先和北韓駐中國大使李周淵談話。金說，毛是他的好朋友，他會幫助北韓攻打南韓，金希望李周淵在北京更加積極地進行活動。然後金日成走到蘇聯大使館參贊伊格納捷夫和白留捷夫旁邊說，中國已經完成了統一，現在該輪到統一朝鮮半島了。又說南朝鮮人民信任他，而且盼望統一，現在北韓人民軍是一支強大、優秀的軍隊，「每每想到我們絕不能辜負南朝鮮人民的期望，我經常不能入眠。」還說，萬一統一被推遲了，南朝鮮人民對此會極大地失望。

在這次宴會上，金日成又請史吉科夫回憶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史達林在會晤金日成

^{註⑯}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二一。

^{註⑰} 林彪（代表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馬仲可，前引書，頁十九。

^{註⑱}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特級電報（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二〇。

^{註⑲} 聶榮臻回憶錄（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頁七四三～七四四。

^{註⑳} 荻原遼，朝鮮戰爭，東京，文藝春秋社，一九九三，頁一四三～一五四。

^{註㉑} 克里姆林文獻檔案編號：“KA45 / 1 / 346 / 6”，摘引自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前引書，頁三六九。

時的談話^⑦，當時史達林要求北韓只在南韓進攻北韓時進行反擊。金日成對吉吉科夫說：「現在李承晚遲遲不進攻而按兵不動，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反擊。」金日成希望，就此問題，要求直接與史達林再次面談。金說，如果見史達林有困難，那麼想直接找毛澤東談，因為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現在（五〇年一月十七日）一直在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所以可以預測，對朝鮮半島問題也已經有了結論。金日成當著史吉科夫的面回憶，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見他時，當面說過，中國全部解放以後，援助他解放南韓。

在場的蘇聯外交官們，對金日成咄咄逼人的談話採取迴避的態度，於是，金日成再次走到史吉科夫旁邊反覆強調自己的上述見解。

史達林給史吉科夫打了決定性的回電。這是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在電報裡史達林強調說，「我們充分理解北韓領導人的不滿情緒，但他們應該對南韓的狀況做更加細緻的準備，不許進行任何冒險行動。」史達林補充了一句，他希望同金日成會晤，以進行關於南韓問題的進一步討論，還說，我們準備支援金日成。^⑧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史達林給史吉科夫發來電報，說他與毛澤東同意了北韓用奇襲戰略先發制人解放南韓。^⑨

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史達林給毛澤東發去如下電報：「關於朝鮮同志們開始戰爭的時間，還要得到你們同意，若你們覺得不適宜，則應繼續保留。」^⑩

為了妥善地做好戰爭準備，金日成準備與毛澤東會談。北韓駐中國大使李周淵為這次金毛會談進行事先斡旋，並代表金日成直接和毛澤東會談。毛澤東同意與金日成會談，時間最好是四月末或者是五月初。毛澤東向李周淵說，如果金日成已經有了關於朝鮮半島統一問題的具體計畫，那麼會談應該是秘密的，如果還沒有，則會談可以公開進行。毛又說，如果將來發生第三次大戰，北韓參戰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北韓軍隊應有所準備。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金日成把駐中國大使李周淵轉告他的毛澤東對朝鮮半島戰爭的看法，轉述給史吉科夫。據金的轉述，毛澤東認為朝鮮半島的統一只能通過武力，別無他法。而美國，不會因南韓這樣的戰爭而挑起第三次大戰，所以没有必要害怕美軍介入。^⑪

金向史吉科夫說，他將在五月十三日去北京見毛澤東，準備與毛澤東會談的內容有：1.正式向毛澤東表明北韓用戰爭方式統一朝鮮半島的決心，並轉告在莫斯科會談時史達林對此問題發表的意見；2.關於準備在近期締結的兩國貿易條約和友好條約的問題；3.再詳細地傳達莫斯科史達林與金日成會談的其他問題，以及今後北韓、中國

^{註⑦}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史達林和金日成在克里姆林宮進行的長時間談話，克里姆林文獻檔案編號：“KA45 / 1 / 346 / 24~35”，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前引書，頁三六九。

^{註⑧} 克里姆林文獻檔案編號：“KA45 / 1 / 346 / 8”，德米特里·伏爾科諾夫，前引書，頁三七〇。

^{註⑨} 史達林給史吉科夫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三。

^{註⑩} 史達林給毛澤東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六。

^{註⑪}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六。

兩國共產黨之間加強連繫的問題；另外，金日成將告訴毛澤東他們已經從莫斯科得到了進行戰爭所必需的一切援助。

金日成和朴憲永於五月十三日前往北京，當晚，他們就與毛澤東見了面。^②

四、韓戰開戰前 金日成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會議

金，朴兩人向毛澤東說明了他們與史達林（當時史達林對外有一個假名，叫菲里波夫（Filipov），所以金日成一直以此稱呼史達林）會談的內容。金強調了史達林關於戰爭開始時間問題必須看北韓和中共的協商結果而定的話。當時，毛澤東提出，他想直接聽聽史達林個人對有關即將開戰的朝鮮戰爭問題的說明，於是，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於五月十四日向毛澤東傳達了金日成和史達林的會談內容。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又接到莫斯科方面對史達林與金日成會談內容的傳達。^③之後，毛、金、朴等人開始討論有關朝鮮戰爭的具體問題。

金日成向毛澤東說明了他進行朝鮮戰爭開戰前的三個階段計畫：第一步，增強軍事武裝力量；第二步，向南朝鮮提出和平統一提案；第三步，待南韓政府拒絕和平統一提案，隨即開始軍事行動。

對此，毛澤東表示同意。毛又提出建言。他說，為順利實現戰爭計畫，要進行細緻的戰前準備，北韓軍隊的行動要迅速，要包圍幾個重要城市，但不要為占領而拖延時間。並補充說，對各級指揮官和士兵，要詳細傳達具體戰鬥方針以讓他們熟悉它。^④

毛澤東問金日成是否考慮過日本參戰的可能性。金日成回答說，日本參戰的可能性看來不大，但絕不能排除美國以美軍名義派遣二至三萬名日本軍隊支持南韓戰鬥的可能性。

毛澤東表示同意金日成關於日本參戰與否的見解，並說，如果美國參戰，中國亦將派兵援助北韓。毛澤東補充說，蘇聯由於與美國簽訂了關於以三十八度線分轄朝鮮半島的協定，所以直接參加戰鬥是不方便的，但中國沒有這種約束和負擔，所以可以大膽援助北韓進行戰爭。毛說，如果北韓在中國解放臺灣以後再開戰，那麼中國援助北韓就會更充分。盡管如此，北韓下決心在這個時刻開始戰爭，那麼戰爭就已經變成兩國的共同課題，所以同意開戰，並做必要的協作。毛澤東問金日成，是否有必要在中國、北韓邊境線上增加中共軍隊的佈防，以及是否需要武器和彈藥援助等，金日成表示感謝，並表示無此必要。^⑤

這樣，在開戰之前，金日成通過在莫斯科和北京的連鎖會談，終於得到了史達林

^{註②}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七。

^{註③} 史達林（为了避免史達林親自參與的痕跡，而用蘇聯副外長葛羅米科的簽名）給毛澤東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七。

^{註④}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七。

^{註⑤} 史吉科夫給史達林的電報（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馬仲可，前引書，頁三八。

和毛澤東的同意和支持保證。金日成和朴憲永於五月十六日從北京回到平壤。

五、分析和結論

中共目前仍不承認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已經開始幫助金日成策劃韓戰的史實，並拒絕公布那一段敏感時期的文獻檔案。但從俄羅斯政府最近披露的秘密文獻可知，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就以實際行動支持金日成準備戰爭，並保證待全中國大陸「解放」後支援金日成，特別是保證只要有必要即可出兵相助。有充分佐證說明，韓戰自始至終是史達林、毛澤東、金日成三人共同策劃的。

一直到五十年代初，中共領導人有「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所謂列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列寧在「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權演講提綱」（一九一五年十月）中說過：「無產階級的國際階級鬥爭的團結，較之各國的國界重要。」^{④6}

所以可以認為，當時毛澤東派韋國清到越南打奠邊府戰役，或在道義、物質、武力上支持金日成打南韓，在當時對他們來講是天經地義的，不需要掩飾的。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說，他們將幫助朝鮮人民解放全朝鮮^{④7}；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召開的「亞太地區工會代表大會」上關於「武裝鬥爭是各國民族解放鬥爭的主要道路」的講演^{④8}；以及毛澤東常說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都說明當時中共領導人的心態。

至於中共拒絕承認在韓戰開戰以前已經與史達林、金日成參與策劃這場戰爭的事實，筆者認為在其背後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金日成在發動韓戰以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亞洲政策的本質以及朝鮮半島的形勢做了錯誤評價，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對整個戰爭的進展預測過分樂觀。而毛澤東當時被在極短時間內爭取到的國共戰爭中的輝煌勝利沖昏了頭腦，在金日成急功近利的盲動主義情緒面前，毛澤東失去冷靜的辨別力，把希望寄託在金日成能夠在無需中國出兵的前提下迅速解放南韓。中共領導人經常講：「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但對韓戰問題上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毛澤東說過：「如果不是美帝國主義占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④9}可見，打了一場損失慘重的幾乎是遭遇戰（encountered war）的戰爭，所以在中共對韓戰重新做出歷史評價以前，不宜披露共同策劃韓戰事實。

第二，中共認為「抗美援朝」戰爭是正義戰爭，今後若有需要，還要進行抗美援朝^{④10}。但實際上，這場抗美援朝戰爭是由於史達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在錯誤的時間

註^{④6} 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頁八四〇。

註^{④7}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頁九八七。

註^{④8} 劉少奇選集（日文版），第二卷，東京，三一書房，一九五二年，頁二二九。

註^{④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五十。

註^{⑤0}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版一。

，以錯誤的方式發動韓戰而導致的後果。對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民族犧牲的戰爭，中共和毛澤東要負歷史責任。但目前中共仍堅持「唯我有理，唯我正確，唯我勝利」的「韓戰史觀」，故很難期待中共能在近期承認共謀韓戰的歷史事實。

第三，若從持有傳統主義思想的南韓人民的角度看問題，史達林和毛澤東是幫助金日成共產集團顛覆大韓民國的罪魁禍首。中共說美國是侵略者，因為干涉了朝鮮內政，那麼中共何嘗不是侵略者，因為中共煽動、鼓舞、支持金日成發動顛覆大韓民國政府，殘殺同民族骨肉的韓戰，也是對韓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目前中共遲遲不敢承認在韓戰前與史達林和金日成進行的密室作業，亦是唯恐難逃「戰爭禍首」的倫理責任。

*

*

*